

# 文化遗产赋能文旅产业发展

张继焦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，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。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，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。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，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、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。近年来，各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亮点频出，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，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能量被不断激活，赋能文化发展。

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月18日公布的2024年春节假期8天的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：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.74亿人次，同比增长34.3%；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.87亿元，同比增长47.3%。各地旅游收入相继出炉：北京接待游客1749.5万人次，旅游收入286.5亿元；上海接待游客1675.95万人次，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191.22亿元；广州接待游客

超1555万人次，文旅消费总额超112亿元；天津接待游客1383.94万人次，旅游收入123.45亿元……

各种迹象显示，不但传统节日正在火起来，而且端午、中秋、春节等各种重大传统节日的经济表现，已成为观察我国经济发展动态的一个晴雨表。这些年来，笔者不仅观察和思考传统节日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关系，而且关注文化遗产是如何以自身能量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。

笔者认为，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：物质性文化遗产、制度性文化遗产、习俗性文化遗产，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能量和赋能方式，进行资源配置和促进文旅产业发展。

第一类是物质性文化遗产，主要是指古城、古镇、古村、古建筑、古寺庙、古长城等物质性文化遗产。这类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通常有两种赋能方式：第一种主要以古长城、古寺庙、古墓葬等为主体，将其营造为一个名胜古迹或旅游景区，供游人观光、游览、消

费、休闲等；第二种主要以一个地方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、历史文化街区等为基础框架，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韵味的景点，或者成为都市中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景区。

第二类是制度性文化遗产，主要是指传统节日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些大型传统节庆活动流传了千百年，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，即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、时间、活动内容等，如广州传统迎春花市、海口府城元宵换花节等。这些大型传统节庆活动参加人数众多，少则几万人，多则几十万人，形成吃、住、行、消费和娱乐等需求。

第三类是习俗性文化遗产，主要是指一些地方长年累月流传下来的餐饮、手工艺、歌舞、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；手工艺方面，浙江的东阳木雕和青田石雕、天津杨柳青年画等，都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……这些文化遗产，不但可以发展成为服务于当地旅游的各类企业，而且可以发展成为面向游客的产业集群。

文化遗产赋能有力推动了地方文旅产业发展。以冰雪文化遗产为例，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的数据：今年春节期间（2月10日至17日），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1009.3万人次，日均同比增长81.7%；实现旅游总收入164.2亿元，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35.4%。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均达到历史峰值。哈尔滨市的“冷资源”究竟是如何发展为“热产业”的呢？冰雪文化遗产是如何作用于冰雪产业发展的？

自然状态下的冰雪是寒地居民取用最便利的资源，在早期冰雪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，冰雪文化得以产生。目前，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、冰雪雕技艺已经获批成为黑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重视，进一步提高了哈尔滨冰雪文化的知名度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

是冰雪文化的“集大成”之作，作为全面展示冰雪文化内涵的重要平台和窗口，其文旅融合发展是在文化的传承、整合与创新过程中实现的，从地方的狂欢转变为国内知名和国际性的冬令庆典。

再来看看传统节日。传统节日作为制度性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具有双重意义：一方面，对节日文化遗产自身来说，节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每个节日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，以传统节日为载体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，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，实现结构一功能转变；另一方面，对现代社会而言，传统节日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，以节日为核心，通过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使文化要素与旅游产业要素建立联系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实现以文促旅，文旅融合，为地方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，推动当地形成以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内源性竞争优势。

还有一个常见的文化遗产赋能形式是，在一个地方（如古城、古镇、古村、历史文化街区等），人们将歌舞、餐饮、手工艺等各种活化的文化遗产集中在一起，以五彩缤纷的方式呈现出来和发挥能量，吸引国内外游客，不但集中展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和乡土人情，而且给游客提供吃、住、行、购物、观赏、游玩等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。换言之，原有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、历史文化街区等物质性文化遗产结构，与歌舞、餐饮、手工艺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，由此产生多样性的功能，促进当地文旅产业发展。

总之，文化遗产是可以赋能的，是可以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，不仅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继承与创新，以文促旅，引导资源配置，而且有利于当地文旅产业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并持续发展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、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）

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，与黄河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的长江，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，沿途支流纵横，湖泊遍布。千百年来，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，连接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，形成了社会经济大系统，更孕育了无数的文明。《礼记》中记载：“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。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。”从天子到诸侯都要对其所领地山川进行祭拜，对自然资源中的水更是专门的职官来负责，“仲令之月，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、大川、名源、渊泽、井泉。”自古以来，长江就不仅仅是提供生活水源的自然河流，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之一。

文献典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长江起源、流域、江防、河工以及名人游记等，尤其古地图中的长江图卷则是千百年来长江文化的见证，为全面展示长江文脉，为保护、传承、弘扬长江文化提供了详实直观的历史资料。

关于长江源头，古籍中有多种记载，儒家经典《禹贡》中记载岷山为长江源，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澧；过九江，至于东陵，东地北，会与江；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”但也有人认为长江源头为金沙江。在有关长江的地图中，鲜有专门绘制长江源头的，不过大多会在长江起源处标注地名并标注为长江源头。宋代《禹迹图》中，长江源头处标注“岷山”，并在“岷山”西北标注“大江源”，《舆地图》中则标注为“大江源”。在《华夷图》《历代地理指掌图》中，虽未标注“江源”“岷山”，但在成都西北、威州西侧一条河道尽头标注了“江水”。清代黄钰孙绘制的《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》中也在“岷山”之下标注了“大江源”。清光绪年间《江源图》中，绘制长江出自雪山，并标注“长江万里人言出于岷山，而不知自雪山万壑中来。”

长江源出雪山，向东奔腾，源远流长，风光无限，历朝历代都有画家描绘。明代章藻的《图书编》卷五十八《万里长江图》是古代地理学家系统勾勒长江流域全景的地图长卷，图中绘制范围西起青城县东至江阴，其中水流激荡、高山夹岸。图中江水、高山、城池、楼阁虽仅用墨线简单勾勒，但长江浩浩汤汤之走势，尽在眼前。清冯世基绘制的《长江名胜图》是一幅描绘长江下游风景名胜的游览图，绘制范围从荆江起，流经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五个省份，文字说明部分介绍了长江沿途古迹。与《万里长江图》不同，此图采用传统的山水画法绘制，用简单的笔触勾出水意境，并对一些名胜官殿楼阁采用大比例尺进行细节的描绘，更特别的是此图采用对景法，使两岸的景物与江中行驶在船上的人的视角保持一致，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同样还有清丁应门绘制的《长江图》，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法，形象生动地绘出自武昌黄鹤楼至长江口的长江沿岸山川大势走向，以及两岸省城、府城、县城、村墟、险要、汛地、炮台及江中行船等，并一一标注名称，城镇间详注里程。图上还附有借地名作词之七言“路程歌”24首，也是一幅反映长江全景的巨幅画卷。

由于长江贯通我国东西部，且流量大，全年可以通航，因此自周朝起，长江就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，运输矿产、漕粮、兵员物资等等。隋朝以后，随着连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通，加上横贯东西的长江航道，实现了全国航运通道的贯通连接。绘制于清中期的《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官水道彩色图》是一幅表现长江及运河水道的长卷，高31厘米，长945厘米。本图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法，绘制了长江自荆江以下至入海口一段，大运河自绍兴经杭州至瓜洲再北上至北京紫禁城的水道。地图在长江重点绘制了江中的沙洲、滩涂、吼头、支流、湖泊等与长江航运相关的内容，并贴签标注沿江水势、地名、里程及运河闸坝等。图中城郭、山峦采用形象画法，沿河重要府县、河湖、闸口、关键航道均有说明，各段河道分别标注里程。同类型地图还有《长江运河图》，清光绪年间绘制，绘制出从洞庭湖经长江、运

朱熹《春日》诗云：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人类文化的春天需要不同的色彩，而参与人类文化的色彩，其基本立场也应当是塑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春天。儒家对于差异、多样的强调，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哲理注脚，也是理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视角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，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、包容的胸怀。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交流互鉴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。中华文明的基本哲理是中华文明气象的基础，中华文明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。
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）

## 图绘长江 典传文化

陈红彦 成二丽

河至北京的水运路线。清末民初，大运河淤塞，逐渐停航，但长江航运却在险境中迎来变革，轮船招商局成立，新的长江航线开辟，也刺激了长江沿岸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。

长江既是航运的黄金水道，也是军事攻守的天然通道，特别是长江下游，历代兵家视其为防御要地。明清时期，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，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江防机构，并在沿江地区建造防御工事。明初为了护卫南京，在新江口设有水师，后于沿江地区设立卫所、巡检司。嘉靖年间由于倭寇的侵犯，也加强了江口的防御。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编著有关江、海防的地图和论说，其中《江防图》为明代重要的江防资料。《江防图》共48幅，图沿江西起今江西瑞昌市，东至上海金山区，图中详绘沿江地形、居邑，并注记各巡单位巡防范围、哨所设置及兵将、战船数等。

清沿明制，设操江巡抚统领沿江防务，并在镇江等地设置炮台、拦江缆等军事设施。晚清，政府非常重视江防，除了加强长江入海口及沿岸防守外，还将湘军水师改建为长江水师，维护沿江一带的稳定，并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大量修筑炮台，防线从吴淞口沿江而上经江苏、安徽、江西，至湖北，共建28处炮台群并部署兵力。清同治年间马徵麟受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所托，率队历时8个多月调查测绘，编制了《长江图说》，内有地图72幅，是当时绘制最精确、比例尺最大的长江中下游河道军事地图。图西起荆州，东到江阴，河流以双线标识，地物、山体为形象立体描绘，文字注记长江水师兵力部署、沿江津要、湖泊地形等。除此之外，清周玉生绘《江阴南北两岸炮台附近防营全图》，瓜洲镇总兵署绘制的《瓜标四营江汛全图》，清长江水师节署绘制的《江南长江计里全图》《安徽省城至九江长江江防图》等图标绘出了清晚期长江沿岸修筑炮台、兵力部署以及江宽、水深尺寸等江防信息，另有《江西省九江四路炮台图》《江苏沿江炮台图》等详细绘制了长江沿岸炮台的俯视图、侧视图。

长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当前，13个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，开展历史文化研究，启动考古发掘，进行文物资源调查。悠长深远的长江文化从文物与古籍中走向人民大众，走向世界。

（作者陈红彦系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，成二丽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员）



春节里的舞龙表演

## 从儒家思想看文化多样性

赵金刚

习近平总书记在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指出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。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，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，化解冲突，凝聚共识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儒家文化，其基本哲理是形塑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重要力量，从儒家的基本经典、基本哲理出发可以深入我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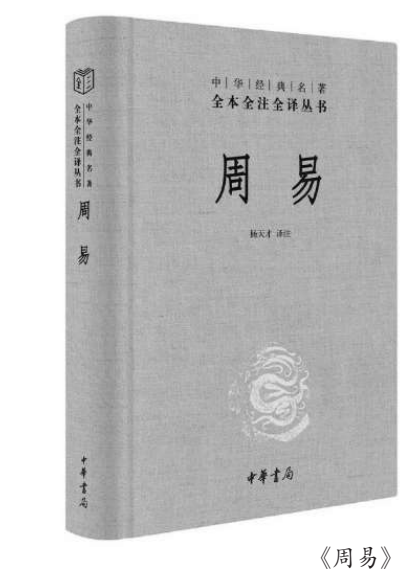
《周易》是“五学之原”，是中华文明哲理的重要基础，其第十三卦为“同人”，象征人与人之间“同心同德”，并特别强调真正的“同心同德”不是完全一样的“齐同”，而是异中求同、包容差异。《同人·

象》言“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”，君子是要通晓世界上不同人的志向，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。《周易》认为如果只和自己想法、意见一样的人“同”，反而会有不好的结果。《周易》“咸卦”也强调，圣人要能认识并感通不同的事物，只有如此才能“天下和平”。由此可见，儒家对于世界大同的追求，不能理解成是消解了不同文化、文明自身特性的结果。

不仅仅《周易》体现了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、尊重世界多样性的立场，儒家的众多基本典籍都将其哲理的这一特征展现出来。如《诗经》有“十五国风”，记录了当时15个不同地区的人民的乐歌，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现状。在解释者看来，只有透过这不同的民情，才能真正理解人心。又如《左传》是解释《春秋》的重要文本，其中有不少讨论涉及“和同之辩”，都强调包容差异的“和”的重要性，认为不同的要素的合理组合，造就了世界的多彩，也使世界生生不息。此外，儒家特讲“礼”，而礼的精神则有“从俗”，有“礼时为大”，都是强调根据不同的人情、时代特征去制礼作乐，而不是用一套绝对的规则强制要求所有人。

可见，对包容的强调、对多样性的尊重，渗透进了儒家的经典世界，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底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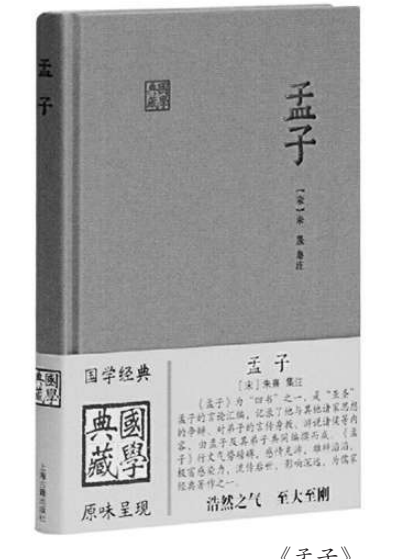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哲学上将这一点讲得最为明确的当属孟子。在《孟子》中，许行的逻辑主张人要在社会中采取相同的行动模式，而孟子讲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，认为万物的最真



《周易》

实的存在样态就是“不齐”，差异是世界的“实情”，事物的差异是天道的展现、是造化的必然结果，而强制性的“同”会导致世界的混乱。儒家所追求的“平等”不是“齐同”，而是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，让万物各尽其性，将自己的本性充分发挥出来。

儒家哲理对包容性、多样性的强调，还体现在儒家的正义观。在对“义”的理解上，儒家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僵化姿态，而认为“义者，宜也”，也就是要在不同的、具体的场景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义，而不是用某种不兼容具体性的抽象原理作为正义的标准。对“宜”的强调反映了儒家对于事物具体性的尊重，即要内在于具体的情景，理解正义原则，而不能脱离具体性而看待道德法则。



《孟子》